

往事如昨

难忘电影《喜盈门》

徐爱清

20世纪80年代,家庭伦理电影《喜盈门》风靡大江南北,好评如潮,该片也因此成为当时家庭教育的活教材。

我第一次看《喜盈门》是1983年。那时,我还是一名中学生。秋天的一个星期天,母亲说,晚上村里放电影,我听了十分高兴。天刚黑,我就早早带上板凳到了放映场。放映场已挤满了观众,到处是喧哗声。村里的四婶先前已经看过一遍,喋喋不休地跟大家介绍着剧情。妇女们围成一圈,听得聚精会神。直到电影开始放映了,放映场才安静下来。

电影在一场欢快的喜宴中开始了,普通的农家小院,热闹的场景,让我想起大哥结婚时全家人喜笑颜开的一幕。随着故事的深入,我感到影片的情节索然无味。我当时是一个懵懂的孩子,对于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庭人际关系不感兴趣。于我而言,《喜盈门》这样的家庭剧,远比不上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之类的战斗片看着过瘾。我开始做小动作,和孩子们交头接耳,窃窃私语。母亲插了我一把,训斥道:“不要乱说话,影响别人看电影。”我心不在焉地看着屏幕,期盼着电影早点散场。

大人们就不同了,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,生怕漏掉一个情节,心情也随着电影情节的深入而起伏不定,悲喜交加。有人为二儿媳水莲的善良感慨万千:“将来要是咱能说这么个儿媳进门,该有多好啊!”有人对大儿媳强英的蛮横无理加以指责:“简直就是一个泼妇,都怨她的父母教女无方,哎!给娘家人丢脸啊!”看到大儿子仁文在强英面前唯唯诺诺,母亲随口骂了一句:“窝囊废!”

电影结尾,一家人摒弃前嫌,和和睦睦,重新开始新的生活,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回家的路上,大人们仍然叽叽喳喳争论不停。第二天,《喜盈门》依旧是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。我们家也如此,餐桌上,一家人说得最多的是《喜盈门》里的话题,有时因为观点不同,争得面红耳赤。我不理解,不就是一部电影编出来的故事,至于吗?一天晚上,我听父亲和母亲议论家务事,母亲说:“咱家老二都结婚一年多了,虽说儿媳跟咱们没红过脸,可家早晚要分,不如趁好把家分了,免得以后闹出点不愉快再分家,让街坊邻居笑话。”父亲点头同意了。

一天晚饭,母亲对二哥说:“你看咱家家口这么大,眼睁睁地老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以后花钱的地方更多,妈不想拖累你们,不如分开过吧。”二嫂听了,连连摆手,说:“不行,村里人该说我是电影里的强英了,吐口吐沫也能把我淹死,我们可不愿当那‘罪人’。”说着,撒娇地搂着母亲的脖子,说:“娘,一大家子一起过,多热闹啊,你就狠心把俺们撵出去。”母亲笑笑说:“媳妇啊,你想哪儿去了,分家是早晚的事,咱们家又没有家庭矛盾,这叫和和美美的分家,放心,别人不会说三道四的。”

秋天,打了新粮,我们和二哥分家了。二嫂挑了最破旧的一栋房子,除了粮食,二哥二嫂几乎是净身出户。母亲感动得直抹眼泪,不住地唠叨:“咱家八九口人,日子过得穷啊,委屈你们了。”二嫂笑笑说:“娘,你说哪儿去了,日子靠我们自己去过,咱们分家不分心,和和睦睦一家人,有难同当,有福同享。”

那一刻,在我眼里,二嫂真伟大,懂得为家庭分忧解愁,不亚于电影里的好儿媳水莲。

我本村的舅舅常年患有风湿性腿痛。舅妈去世早,舅舅和儿子分家后,这几年没少遭罪。儿子儿媳看了《喜盈门》后,心中内疚,上门接舅舅去他们家一起过。舅舅怕连累儿子儿媳,说什么也不肯。儿媳急了,说:“爸,以前是我们错了,没有孝敬好你老人家。乡亲们背地里都叫我‘强英’,你想让我背一辈子的骂名啊!”

说完,夫妻卷起舅舅的铺盖,背起老人,说:“走,让爸回咱家。”舅舅趴在儿子背上,对大街上的街坊邻居说:“儿子儿媳孝顺啊!”

我问母亲:“娘,一部电影咋有这么神奇?它能改变一个人做人处世的观念?”母亲笑笑说:“等你也结婚生子了,就会理解《喜盈门》里的家长里短了。”

《喜盈门》传递着家庭正能量,成为村里人做人处事的一面镜子,敬老爱幼蔚然成风。村里的老支书深有感触地说:“《喜盈门》不愧是家庭教育片,它的作用远比一个妇女主任大,许多家庭矛盾因为电影而迎刃而解,这样的好片子应该常看。”

第二次看《喜盈门》,是1990年。村里的黑子结婚,他的父亲赵福请来放映队,以示祝贺。赵福点名放映的影片就是《喜盈门》。赵福说,现在改革开放多年了,日子越来越好了,但敬老爱幼的优良传统不能丢。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《喜盈门》,接受家庭伦理教育,家庭和睦的好家风才不会丢。

这年,我已是结过婚的人,再看《喜盈门》,有着不同的视角,许多故事情节是带着感情看完的。我最佩服的是电影里的爷爷,强英一家吃饺子,却让他啃窝窝头,这样过分的举动,爷爷没有得饶人处不饶人,而是从一个家的幸福角度出发,宽宏大量,原谅了强英。强英终于良心发现,改邪归正,做起了好媳妇。另外,从丈夫仁文身上,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一个男人,要想维护好家庭的和睦,就要善于与妻子沟通,善于化解矛盾,起到一个家庭“顶梁柱”的作用,才会有效地避免家庭矛盾的激化,幸福一家人。

夜里,我和妻子再次谈论起《喜盈门》。妻子说,《喜盈门》反映出的是许多农村家庭的生活片段,或者说一个缩影。她作为年轻人、小字辈,从中受到很大启发。俗话说:家和万事兴。与公公婆婆也好,与妯娌之间也好,与小姑小叔也好,都应该尽好自己的义务,处理好利益关系,不能斤斤计较,行得端走得正,才会维护好家庭的和睦。二嫂水莲是我的榜样,我应该向她学习,做一个人人佩服的好媳妇。

第三次看《喜盈门》,是2015年,电视上电影频道播放的。儿子已经成家立业,我和妻子从当年的媳妇、丈夫熬成了公婆。看完电影后,妻子说,家庭和睦不和睦,婆婆也是一面镜子,她要像强英的婆婆一样,不能老盯着小辈的缺点,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,当好“和事佬”,才会受到小辈的尊重。

时光荏苒,转眼三十年过去了。我看过的电影不下几百部,但《喜盈门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。这么多年来,在《喜盈门》的陪伴下,我们一家几代人的大家庭和睦相处,喜气盈门,幸福常在。

一次特别支委会

赵寿彰

1971年仲夏,我所在的连里举行了一次特别支委会。

说特别,是因为会是专门为排长杨海成和我召开的。说白了,就是一次“挨批”的会。会由党支部书记牛会吉主持。牛是一介书生,鼻梁上架一副眼镜,人长得细细瘦瘦的,嘴有点地包天。他原是洛阳步兵学校的政治教员,因“文革”学校停止上课,他便主动要求下基层部队,被分配到我连担任指导员。

先说一下排长老杨“挨批”的原由:有战士反映,他搞特殊。吃饭时,他时不时自己或打发别人去炊事班拿大葱。

说老杨拿大葱,确有此事,我也亲眼所见。老杨是临沂人,临沂人爱吃煎饼卷大葱是不争的事实。他看见大葱,像猫见了腥似的,即使不夜不晌也不到饭点,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过一根,麻利地把葱皮一剥,裸露出细嫩多汁的葱白,再把葱头上的死叶黄叶胡乱揪吧揪吧,放进嘴里,咔嚓咔嚓就吃下去,根本不嫌辣不嫌脏。我们部队在临沂城驻防时,有一天,乡下老家来了他的几个发小,什么肴也没有,只靠几棵大葱,就喝光了一瓶老白干。

发言时,老杨承认了自己拿葱的事实。又说出了另外一件事情:前几日,他的一个要好的中学同学到军营找他,他因种种原因,没去机关小灶自己掏钱请同学,而是让炊事班小张利用空闲时间替他做了一盘芹菜炒肉、一盘西红柿炒鸡蛋。老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,让他搞军事训练没得说,如同武松打虎里所讲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,那是挟风带雨。可让他说话,那真是逼鸭子上架,说得是结结巴巴,根本不成套。他请同学吃饭的事情大家本不知道,现在他自己抖搂出来了,从中可看出他态度之诚恳、改正错误之决心。

和老杨的拿大葱相比,我的故事简直可以算是一个漂亮的文学脚本:我与老杨一样,都是两个月之前下的干部任命。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提拔。我1968年入伍,从列兵干起,入团,入党,思想要求进步,工作也是一步一个脚印,样样走在前。提干不但是对我当兵三年以来工作的肯定,重要的是从战士到干部的身份转变。这事带给我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。我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父母。独生子有了出息,父母比我还高兴。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在熟人中广而告之,并邀请一众亲朋好友来我家,父亲亲自掌勺,以示庆贺。

那时候,也是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“三大件”最火的时候,父母认为儿子当了干部,应该有块手表才对。于是,两位节俭了一辈子的老人又做了平生最奢侈

的决定:为我买一块手表。手表是当时市面上的紧俏货,分国产和进口两种,当时最有名的国产手表是上海出的,120元一块。外国的以瑞士表为主。买手表需要票证,而买进口的还需要外汇券。父母想,买就要买块好的。他们托人操持了外汇券,当时的海员俱乐部位于海港路与北马路十字路口的西南侧,那儿有一个不大的外汇商店,卖两种牌子的手表,分别为欧米伽和英纳格,欧米伽185元一块,英纳格225元。父母为我买了块英纳格手表。另外,还为我买了一双上海产的正宗牛皮三接头皮鞋,那是当时最时尚的皮鞋之一。后来我才知道,父母为我置办的这两个物件,几乎花光了当时家中所有的积蓄。大姐趁出差的机会,把东西捎给了我。

按当时野战部队的规定,干部可以戴手表,战士不允许。我是刚刚走上干部岗位,急三火四地戴上手表,而且是价格不菲的外国货,多少有贪图虚荣之嫌。但买也买来了,不戴又不甘心,心里发痒。我不敢戴在手腕上,而是撸到小胳膊上,并刻意用衣袖遮住。我一般不在外人面前看时间。周围无人时,才急忙撸起衣袖看一看。尽管我小心谨慎,但还是被发现了,传到连队领导耳朵里。

牛指导员虽然来到我连时间不长,但他对人的心理颇有研究,心也很细。他认为拿大葱、戴手表虽然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,但却反映人的心理变化,要认真对待。特别对于新干部,要让他们知道分寸,看见自己脖子后那些看不见的灰,这样才能保护他们,有利于他们今后的成长。因此,他主动提出召开这次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的支委会。

会上,支部委员纷纷发言,谈了自己的看法,总的意思是,既然大家有反映,就要本着“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”的原则,以实际行动和努力,挽回在群众中的负面影响。最后是牛指导员发言,他从理论上分析了特权思想、享乐主义对工作和个人成长带来的危害。他说有问题不要紧,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与问题作斗争的勇气。很多事情都是从小事积累的,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小处着眼,防微杜渐,严格要求自己。只有这样,才能经得住各种诱惑,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,守住底线。牛指导员不愧是政治教员,说起话来有理有据,春风化雨,我们听来也心悦诚服。三年后,洛阳步兵学校恢复教学,他被调了回去,后来成了一名教授。

后来,我与老杨转业至地方工作。那次特别支委会,对我们的人生一直有着重要的指导与影响。